

東君
關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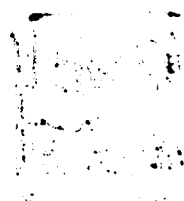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: 东 方 闲 情
作 者: 黄卓越等
出 版 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(南昌市新魏路 5 号)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 江西印刷公司
开 本: 850×1168mm 1/32
印 张: 18.5 插页 4
字 数: 42万
版 次: 1991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—7,000
定 价: 9.40元(平) 11.90元(精)
ISBN 7—80579—120—1/G·10

邮政编码: 330002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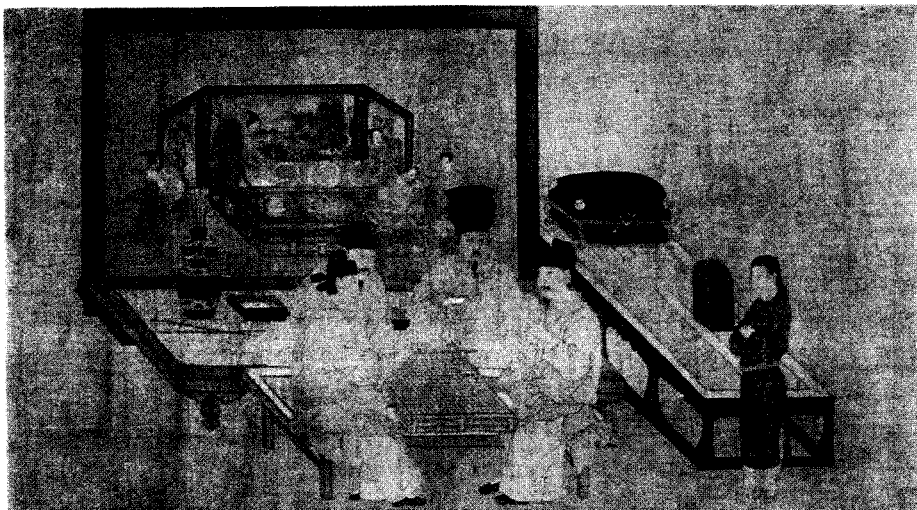
撰 稿 者 (以姓氏筆劃為序)

馬 靜、于 丹、王 鈞、李繼凱、李珣平、
沉 靜 陳冠明、周京南、黃卓越、郭小明、
張伯瑜、黨聖元、董 晉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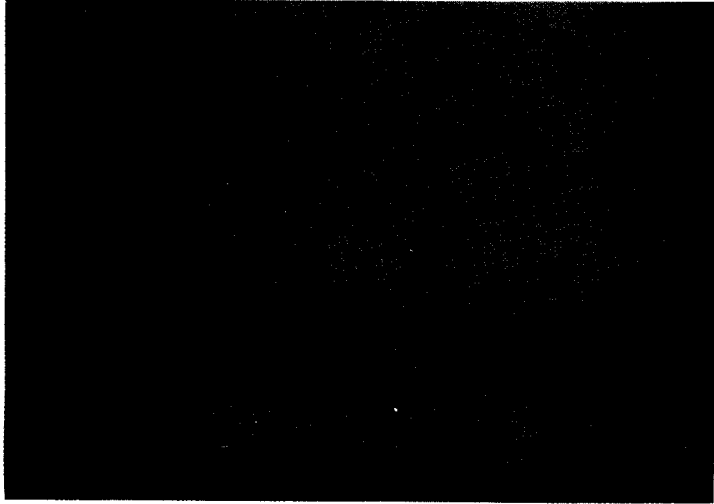
西園論藝圖 劉凌滄



重屏會棋圖 （五代）周文矩



韓熙載夜宴圖 （五代）顧闳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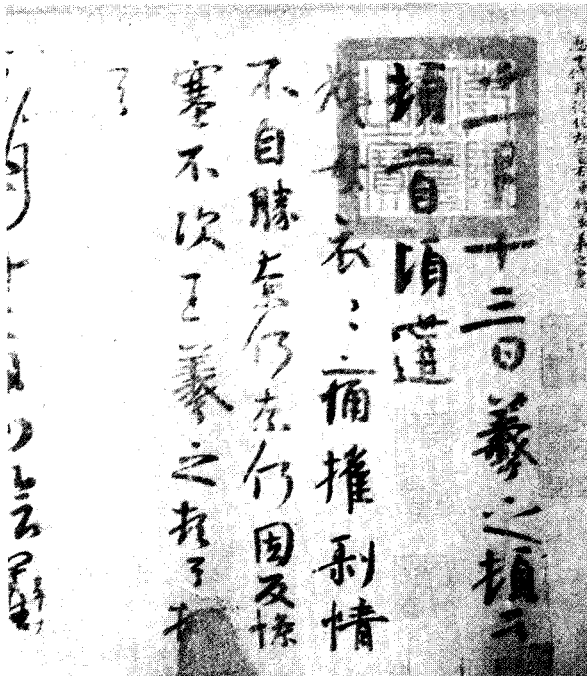
事茗圖
(明) 唐寅



觀鳥捕蟬圖
(墓壁畫) 佚名



柳毅傳書
(元) 佚名



王羲之
姨母帖



貽鶴寄書圖軸
(清) 邵爾



烹茶洗硯圖
錢慧安



圍爐博古圖（清）佚名



人物
故事圖冊
(明) 仇英



晴巒蕭寺圖軸
(北宋) 李成

快乐的光阴（代序）

尽管阅读了许多现代的历史书籍，我们未必就真正地了解了古人。这是因为一直就存有一种偏狭的观念，以为历史便是由一些决定社会及个人命运的重大事件组成的，因而只需将这些事件呈现出来，便可晓谕了历史的概貌。但情况并不那么简单，实际的历史总是与观念的历史有着很大的间距。实际的历史是已逝了的古人的全部生活，既然是生活，那么就不仅有诸如辅国封疆、征伐劫掠、居产贡纳、修身治业、礼仪纲常等“重大”事务，也应包含有比这些更为丰富、具体的人生行为，除了担负起庄严的人际功业之外，古人还不时地处于轻捷、散放的闲暇生活之中，心有余裕，即栖情物外，悠然淡适，而赏玩清遽。这些内容构成了漫长历史中的一段快乐的光阴，是古人愿意生活于世、乐于生活于世的重要理由之一，也正由此，历史方会是优雅和幸福的，使后人在追忆中还能得到一些快慰。

这不单纯是一种生活，它同时又是一种观念。古人们不仅对此具有良好的感觉，也

将它们看作是某种志趣。在早期的圣贤孔子身上，我们看到他在倡导人际的功业之后，就很重于性灵的怡乐。《论语·先进篇》有一段写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问志的文字，孔子没有在意于辅千乘、足民生、相宗庙的要求，而是赞赏了“浴乎沂，风兮舞雩，咏而归”的赋闲风范。而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，世用与燕闲、居士与行藏不仅不是一种补充，甚至还是根本对立和相互侵蚀的，由此而推广到人生哲学的层面上，便是外与内、社会与个人、限制与自由的冲突。世用被视为是“不得已”、“形役”、“尘劳”，是相对于轻快人生而言的重负，相对于娱乐人生而言的累苦。而由闲情所出的快乐，则是生命本体自身的欣赏与钟爱，进一步，它又是一种征服时间的最佳方式，正是在世用行为抛锚的地方，才开始了人生的意义。因而，陶弘景曰“任性灵而直往，保无用以得闲”；稽康曰“浊洒一杯，弹琴一曲，志愿毕矣”；高濂进曰“四时游冶，一岁韶华，毋令过眼成空。当自偷闲寻乐，已矣乎！”

从传统文化固有的那些理论形态看，庄子及后来道家的任性灵、却尘累、超物象的思想，对古人对闲逸生活方式的选择影响最大。但庄子的“游”说，在其层层驳落、层层超迈之中，带有一种只可神会而无从附着的

形而上性质。庄子之游既高且玄，故此弃绝于具体的行成、无容于可待的处居，实际上是将生命的意义及快乐虚设化、空幻化了。而人，必竟生活于世，他们需要贴切、细腻、可目随耳接，可嗜求、可贪恋、可品享、可以身手攫取和操行、可令人动心荡情的实在的快乐，从而能将道家漂渺无迹的“游”历降到能真实感受的生活层面上，将那种“冷漠”的玄趣转化为温馨的快感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古人创造了、并热情地迷恋于各种具体的闲情形式，将它们带入岁月的每个空间，并使其成为比道家美学更具广泛实践意义的人生行为。

这种赋予人生以实实在在的快乐观念，深深地根置于性情温良的传统中国人心上，以至成为人类文化视野中最具特征的一部分。没有哪个民族象中国人那样沉溺于闲暇，散漫而疏放、优游而冥如，从而能将各种闲情类型当作人生的最高形式之一，以绚烂的生命之“轻”来拗救严峻的功业之“重”。由此，居则泉石花竹，诗酒棋书，清谈酬唱；行则披阅中壑，游戏平甸，濯清流以灼游鯉，坐茂林而观佳夕。含英咀华，识度闲放，忘情于珍猎之抱，畅志于清旷之乡，以此而自娱，风雅而自任。在激荡晦暗的争抗的历史背面，可看到的是一片古老常青的天

空和平明闲放的悠景，是东方式的情调，东方式的优雅和瑰丽。

这些闲情方式也直接反映了传统中国人固有的心理结构，即对感受性体验的偏好，进而发展为对性灵的重视。枯燥、抽象的哲理思考只是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才为人称尚，玄学的热衷也不曾取代古人对感性生命的欲求，而是更经常地被落实到了具体的感性层面之上。一部中国文化心态史，根本无法以一些哲学思想来涵盖，我们越是深入到古人的生活世界之中，就越是发现那最普遍、最令人亲近的便是他们充沛、丰富的感受性事实，以及在此基础上更趋于精神化的性灵。一种与理性、功用相拒的、感受层面上的性灵，是古代中国人最特出的精神品貌，而它，正是在各种闲情形式中实现的，又反过来陶铸着各种闲情形式。各种闲情形式所具的精微美妙的具体性，与东方性灵的感受性品格是一致的，以至使闲情的嗜好成了来自心灵底层的欲望。

另一方面，一些闲情形式显然又外在表现为确定可把握的赏玩模式，如对弈、琴乐、书画、品茗等，都有特定的对象、技艺，而这又生发出特定的感知方式、品鉴方式等等。起先，这些模式还较简陋，随着模式内部自身的发展，在数代人的精心构制下，遂

成为更完善的系统。由此可见，这就不单是由性灵就能完成的，在模式的趋于完备、成熟的过程中，也充分融入了与感性把握密切相关的心智。所谓东方型的智慧，也充分地表现在古人的闲情活动中，除了一切都那么随意、散漫之外，在对一些赏玩模式的设计中，又如此诸于品鉴、审美，不惜精心或悉心，以使赏玩对象与方式随处都适于寄闲托悠的需要。没有哪个民族象传统古人那样精于玩赏、善于玩赏、敏于玩赏，对人生快乐的渴求投诸如此充分的心机，如此地企望优雅和风致。

为了能较为具体、真切地再现古代中国人曾经有过的快乐的生活，以及置于其中的活生生的感受力、智巧和嗜望，本书不是单纯地介绍一些静固的形态，而是在可能的范围内，力求寻找生活过的人，写他们在闲情生活中的一种行为方式，将古人、古事、古意结合一体。同时，为使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导读的性质，也对各种闲情方式的历程、形态做了一些穿插介绍。正是因此，本书的描述可能是典范的，但未必是全备的。我们的原意或许不全是为了某种历史事实本身，在撰写过程中也不时会涌出对现代生活的种种联想、思考，但为保证文体本身的纯粹性，也就只能限于对历史事实的单纯描述。因此，

留下的余韵就只由读者自己去加以体味，无须赘述了。

本书承蒙中国社科院、中国艺术研究院、中华书局、中央音乐学院、北京大学的一些朋友合力撰写。钱宏君在著述的设计、组稿修订、定稿出版诸方面费心最多，以至才有全书今天的面貌。于丹君在整个成书过程中也多资鼎助，并选定了全书的大部分插图。均在此致谢。

黄卓越

一九九〇年冬于北京海淀